

學術論文

台灣面對中國軍事威脅下的「政治準備」

Taiwan's Political Preparation under the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陳亮智 *Liang-Chih Evans Chen*

國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員

*Associate Researcher Fellow of Division of Defense Strate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摘要 / Abstract

在過去的幾年裡，因為面臨中國的軍事威脅，台灣在相關的軍事防衛以及「灰色地帶」與「混合威脅」等議題上確實進行了許多的討論與推演，但是在一個「宏觀的政治問題」上的探究卻是付之闕如。換言之，台灣在軍事、經濟、科技、輿論與法律等面向的準備之外，在一個大架構之政治上的準備是什麼？本文以概念性分析為基礎，認為「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不單是軍事上的準備而已，台灣也必須留意相關的政治問題與挑戰。整體而言，在台海戰事爆發之前與進行之中，台灣面對戰爭態度的「一致性」至關重要，而台灣亦必須同時努力推動「戰略溝通」，對象則包括國內主要政黨、政府部門、與社會輿論，以及美國及國際社會。在戰事接近尾聲與結束之後，台灣最主要的政治課題是國家身份、憲政體制、與中國關係的重新定位，而軍事行動上的結果將決定台灣能採取什麼樣的
政治選擇與安排。

Due to the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Taiwan was undergoing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of its reactions to self-defense, grey zone operation, and hybrid warfare in the past years. However, talks on a macropolitical issue are relatively few. In other words, in addition to preparing for challenges of military, economy, technology, and opinion and law from Beijing, it is a time to think of another political concern for Taipei at this momen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n approach of conceptual analysis and I primarily argue that Taiwan has to get ready for a tougher political challenge following the process of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First of all, just prior to and during the bonfire, Taiwan needs to effort at reaching a consistency of its position on war against China, and keeps working 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nation per se an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well. By the end of the war, the major political agendas for the island are to redefine its *stateness*, constitutional order,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Generally, Taiwan's option and arrangement of a new political order are rooted in the consequence of th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in the Strait.

關鍵詞：中國軍事威脅、政治準備、戰略溝通、憲政秩序

Keywords: Chinese Military Threat, Political Preparation,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Constitutional Order

壹、前言

近幾年來，中國對台灣的安全威脅非但與日俱增，其對台灣安全威脅的型態也亦趨複雜而多樣。北京對台北的安全威脅不單只是來自於傳統面向的軍事威脅，更有許多來自於非傳統領域的襲擾，包括網路攻擊與假新聞（或假訊息）的散佈，對關鍵基礎設施的侵入與破壞，以及對各項公職選舉的介入與影響等。此外，北京更是利用「三戰」（three warfares）—法律戰、心理戰、輿論戰三者—對台灣及其他民主國家的政府部門、學術社群、傳播媒體、企業界與文化界等，進行影響與干擾。¹ 正因為如此，台灣在有關如何回應來自中國的安全威脅問題上，除了倡議從「創新與不對稱」的思維來建構其以小搏大的反制策略外，近年也多在「灰色地帶」（gray zone）衝突與「混合威脅」（hybrid threat）議題上進行討論。加以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衝擊，台灣在這些新課題上的確面臨許多新的衝擊與挑戰。

為了因應上述安全環境的改變，台灣與國際社會確實針對這些安全威脅進行了許多的討論，並且提出許多相對應的解決方案或策略。在這些方案與策略當中，本文發現，有關軍事防衛計畫或因應「灰色地帶」行動及「混合威脅」的討論確實佔據了大部分的篇幅，² 雖然也有若干文獻是在

¹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ovember 29, 2022, p.62, <https://media.defense.gov/2022/Nov/29/2003122279/-1/-1/1/2022-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DF>。

² 相關的文獻例如：易思安（Ian Easton）著，申安喬、李自軒、柯宗佑、高紫文譯，《中共攻台大解密》（台北：遠流出版社，2018年）；張國城，「台灣軍事戰略發展方向—『立足現況，因應威脅』的觀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5卷第4期（2019年），頁133-151；Liang-chih E. Chen, “Revisiting ‘Revisiting Taiwan’s Defense Strategy,’” *Defense Security Brief*, Vol.8, Issue.1 (2019), pp. 28-40; Lauren Dicke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U.S.-Taiwan Security,” *Asia Policy*, Vol. 14, No. 4 (2019), pp. 18-25; Brendan Taylor, *Dangerous Decade: Taiwan’s Security*

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面闡述如何反制中國的滲透與侵擾，³ 然而，在回應北京對台北的安全威脅上，台灣除了在軍事與安全議題上進行了許多的討論與推演之外，在一個「宏觀的政治問題」上的討論與推演又是什麼？⁴ 換言之，在應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時，台灣在軍事、經濟、科技、輿論與法律等面向的準備之外，在一個大架構之政治上的準備是什麼？該思考什麼？這是本篇論文最主要的問題意識。就邏輯推演來說，「軍事」與「政治」常有緊密的相互依賴關係—「軍事可以影響政治的後果」，「政治可以決定軍事的行動」，或者「軍事是政治的延長」，「軍事是為政治做服務」，抑或是「軍事政治化」，「政治軍事化」等等。整體而言，在安全議題的研究上，「軍事」與「政治」之連動關係的討論有其必要。

作者於此所欲強調的是，相對於一般的「經驗性研究」（empirical research），本文為一偏向「概念性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的探討；非根據已發生的事實做觀察、分析，而是針對尚未發生，但很有可能即將到來的事態預作推演。本文論述發展如下：首先，定義文中所謂「軍事以外的政治準備」。其次，探討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當中，台灣在交戰前與交戰中可能面對的政治挑戰，並且釐清政治挑戰所發生的

and Crisis Management (London, UK: Routledge, 2019); Fu-kuo Liu, "Taiwan's Security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Era: A Review of External Assist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Defense Industry," *History of Global Arms Transfer*, No. 9 (2020), pp. 3-25; 李喜明，《台灣的勝算》（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³ 請參照：范疇，《被迫一戰 台灣準備好了嗎？》（台北：八旗文化，2021年）。

⁴ 雖然台灣在政治上也做了若干的防範措施，例如2019年6月修訂《國家安全法》，針對若為中國共產黨發展組織，將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罰1億元；修法納入「網絡共諜」；對現職或退休軍公教人員涉入共諜而判刑確定者，取消退休俸資格，而支領的部份亦將被全數追回。以及2020年1月所公佈實施的《反滲透法》，用以反制「境外敵對勢力」對台灣政治與社會之滲透與干預。但仍有其他政治問題是台灣並未碰觸的。例如在與敵對一方進行交戰的過程中，台灣社會或軍隊若是出現「主和」或「反戰」的聲音時，其是否會影響政府對戰事的領導與主張？是否最終會影響交戰的結果？又例如在與敵對一方的戰事接近尾聲或結束之時，台灣的政治方案或政治主張又為何？戰事的成敗與台灣的政治方案或政治主張又有何關連性？顯然國內對這些問題並未進行討論或推演。

地方。再者，探討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當中，台灣在戰事末端可能面對的政治工程，以及台灣可能提出的政治方案。最後，本文總結台灣如何在不同的階段裡提出相對應的政治準備工作。

貳、定義「軍事」與「政治準備」

本文在此所調的「軍事以外的政治準備」，其「軍事」(military)與「政治準備」(political preparedness)的定義如下：首先，就「軍事」而言，本文所指乃為「台灣解放戰爭」(從北京的角度而言)與「台澎防衛作戰」(從台北的角度而言)；兩者所指涉乃為同一件事，只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其所指稱的名稱即為不同。進一步申論，對中國而言，「台灣解放戰爭」的最終結果必須是「登陸台灣、佔領島嶼、並且有效統治」，如此始能稱為「台灣解放戰爭」的勝利。若此，對台灣來說，即是「台澎防衛作戰」的失敗。換言之，就算解放軍贏得某一海上戰役，取得制空的優勢，或成功登陸台灣某一處海灘，但最終仍無法佔領島嶼全境並且有效實施統治，則其「台灣解放戰爭」依然失敗。對台灣來說，此即「台澎防衛作戰」的勝利。在接下來的行文當中，作者主要是以「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表示本文所指的「軍事」、「戰事」或「戰爭」。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北京發動「台灣解放戰爭」的終極目標必須是「登陸台灣、佔領島嶼、並且有效統治」。若只是贏得某一海上戰役，取得制空的優勢，或成功登陸台灣某一處海灘，其意義不大，因為這距離北京「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的目標仍相去甚遠。此外，發動台灣海峽上的任何一場戰役或軍事衝突，卻沒有完成「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的目標，這對北京而言將帶來巨大的政治風險與成本，包括來自於美國與國際社會的輿論反彈，引發美國的軍事干預，甚至是美中軍事衝突，並且加大台灣民意的反中聲浪，以及可能衝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基礎與正當性等等。因

此，對北京來說，既是發動對台軍事行動，其必須走上徹底的「解放戰爭」，而且必須成功。若非如此，則北京發動對台的軍事衝突將轉趨保守，或只能持續、加強對台北施予各項的壓力，而不會真正地碰觸軍事衝突與戰爭。

其次，就「政治準備」而言，本文所指乃是就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而言，其如何在上述「軍事」（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當中因應「政治因素」的影響，並且提出適當的解決策略或方案。進一步申論，本文界定在兩個階段當中所屬的特別問題：第一、在交戰之前與交戰之中，國際社會與台灣內部若是出現「主和」或「反戰」的聲音時，其是否會影響中央政府對戰事的領導？其是否會影響交戰的開啟與作戰的結果？中央政府的「政治準備」應當為何？第二、在戰事接近尾聲或結束之時，台灣相對應於戰爭結果的政治方案或政治主張又是為何？戰事的成敗與台灣的政治方案或政治主張又有何關連性？中央政府應當做什麼樣的「政治準備」？

對此，一個與「政治準備」即為相近的概念是「政治作戰」（political warfare），然兩者仍有區分的必要。所謂的「政治作戰」，係指「除直接以軍事或武力加諸敵人的戰鬥行為外，皆可謂之政治作戰」。換言之，武力作戰即是「鬥力」，而政治作戰則是「鬥智」。⁵ 從定義而言，「政治作戰」基本上是用於「針對敵對一方」之軍事武力以外的作戰方式，包括宣傳、輿論、資訊、心理、與法律等層面的運用。然而「政治準備」則是傾向於「既向『己方』也向『敵方』及『他方』」在政治問題上進行溝通與應對。例如：在面對前述之交戰前與交戰中，分別來自於國外與國內的「主和」或「反戰」聲音時，做為戰爭參與的一方，其一方面必須限縮這些聲音可能對作戰準備與作戰進行的干擾，其另一方面則必須向這些聲音或相近的立場做出溝通，此即為軍事武力以外的政治準備工作。又例如：在面對交戰即將結束或結束之後的新秩序問題與政治談判，做為戰爭參與

⁵ 蔡政廷，「新世紀國軍政治作戰的轉型與革新」，《復興崗學報》，第 88 期（2006 年），頁 233-236。

的一方，其一方面必須準備好相關的政治方案，另一方面則必須向國外與國內進行溝通、對話，此當為戰爭之外的政治準備工作。⁶ 但不論是哪一個情況，目前相關的研究文獻顯然並未探討此類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卻又是探討台灣安全之外的重要課題，本文認為有其討論的必要。

參、台灣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 之前與之中的政治功課

依上述問題意識與概念定義，本節與下一節分別沿著「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發生「之前」、「之中」、與「之後」的時間順序，逐步探討各個階段裡台灣所面對的政治功課及其應該做好的準備工作（參照：圖一）。第三節主要是集中在交戰前與交戰中；第四節則是集中在戰事接近尾聲與戰爭結束之後。

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發生之前與之中，本文認為台灣最主要面臨的政治問題乃是「主戰」與「主和」兩者之間的拔河。更進一步細分，首先，在戰事發生之前，台灣所面臨最主要的政治課題是對戰爭開啟的態度。根據「主戰」與「主和」的二分法（dichotomy），前者主要的態度與選擇是「應戰」—面對戰爭、準備戰爭；後者則是「反戰」—反對戰爭、避免戰爭。其次，在戰事發生之中，台灣所面臨最主要的政治課題是對戰爭持續的態度。依據「主戰」與「主和」二分法的邏輯，前者的態度與選擇是「持續戰鬥」—接續地抵抗與反擊，直至粉碎解放軍「登陸、佔領、有效統治台灣」為止，後者則是「停止戰鬥」—停止戰爭的進行，兩造雙方在無一明確勝負之下便開始進行政治談判。

⁶ Richard Bush and Ryan Hass, “Taiwan’s democracy and the China’s challenge,” *Democracy & Disorder*, February 2019, https://think-asia.org/bitstream/handle/11540/10226/FP_20190226_taiwan_bush_hass.pdf?sequence=1。

若是兩者旗鼓相當，則台灣的選擇將在戰與和之間拉距。據此，台灣將陷入於一個極端兩極化（polarization）的情境當中。至於是否會出現兩者的力量皆微弱，即主戰的力量很微弱，主和的力量亦很微弱，本文認為這樣的可能性比較低（參照：圖 2）。

		主戰力量	
		強	弱
主和力量	強	台灣走向兩極化	台灣選擇反戰 停止戰鬥
	弱	台灣選擇應戰 持續戰鬥	發生可能性低

圖 2：「主戰」與「主和」力量在
台灣應對「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的可能組合

當「主戰」與「主和」之間的距離愈為接近的時候，例如雙方皆主張在若干的條件下應戰與反戰，則台灣愈可能採取一致的立場（選擇）以面對即將開始或持續進行的「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其可能是「應戰」、「持續戰鬥」，也可能是「反戰」、「停止戰鬥」。相反地，當「主戰」與「主和」之間的立場愈為遙遠的時候，則台灣愈容易出現分歧的狀況以面對即將開始或持續進行的「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而這分歧的狀況將對台灣極其不利，因為總體的力量將被分散，並且在過程中因內耗而損及其回應中國軍事威脅的能力。⁷ 準此，有關台灣在應對處理

⁷ Ghazali Bello Abubakar,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Democratic Process in Taiwan:

是戰是和的問題上，其必須面對來自於另外一方的影響（指戰或和之一方），因此「戰略溝通」（strategic communication）的進行將變得極為重要。若是透過「戰略溝通」而能縮小彼此的差距，進而形成共識，則對台灣行動的一致性將有極大的幫助。最忌諱的是深陷於兩極化的情境而彼此內耗，則不論是對主戰或主和之一方，其成功應對戰爭的機率將大幅降低。

二、戰或和？「力」（might）發生的地方

關於「力量競逐」所發生的地方，理論上，「主戰」與「主和」之間的拔河不只是會發生在執政黨與政府內部，更會發生在「執政黨—政府」與「在野黨」之間，也會發生在「執政黨—政府」與「社會」之間，以及在「執政黨—政府」與「美國／國際社會」之間。⁸ 根據「主戰」與「主和」之間的拔河地點，本文推演以下幾個假說（hypothesis）。

（一）當「主戰」與「主和」的齟齬出現在執政黨內部

假說一：當執政黨內部有關「主戰」與「主和」之意見衝突愈大時，執政黨愈不容易採取一致的立場以應對戰事；當執政黨內部有關「主戰」與「主和」之意見衝突愈小時，執政黨愈容易採取一致的立場以應對戰事。

說明：此最有可能發生在執政黨主管國家安全事務、中國／兩岸事務、與國際事務的相關部門，以及執政黨在國會中的國會議員個人與團體。

（二）當「主戰」與「主和」的齟齬出現在政府內部

假說二：當政府內部有關「主戰」與「主和」之意見衝突愈大時，政

Implication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1, Issue 11 (2016), pp. 47-51.

⁸ Ji You and Yufan Hao,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Nexus of Beijing-Washington-Taipei: Military Interac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hina Review*, Vol. 18, No. 3 (2018), pp. 89-120; Drew Thompson, “The Rise of Xi Jinping and China’s New Er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ssues and Studies*, Vol. 56, No. 1 (2020), pp. 1-25.

府愈不容易採取一致的立場以應對戰事；當政府內部有關「主戰」與「主和」之意見衝突愈小時，政府愈容易採取一致的立場以應對戰事。

說明：此最有可能發生在政府內部主管國家安全事務、中國／兩岸事務、與國際事務的相關部門，包括總統、副總統、國家安全會議、外交部、國防部、大陸委員會等政府機構。

（三）當「主戰」與「主和」的齟齬出現在政府與在野黨之間

假說三：當政府與在野黨有關「主戰」與「主和」之意見衝突愈大時，雙方愈不容易採取一致的立場以應對戰事；當雙方有關「主戰」與「主和」之意見衝突愈小時，雙方愈容易採取一致的立場以應對戰事。

說明：在野黨可視為廣義社會中的一部份，然因其負有監督執政黨與政府之責，且具有政治影響力，因此將其從社會中抽離。

（四）當「主戰」與「主和」的齟齬出現在政府與社會之間

假說四：當政府與社會有關「主戰」與「主和」之意見衝突愈大時，雙方愈不容易採取一致的立場以應對戰事；當雙方有關「主戰」與「主和」之意見衝突愈小時，雙方愈容易採取一致的立場以應對戰事。

說明：於此，社會則是指抽離在野黨之後的私部門，包括媒體、輿論、學生團體、人民團體及組織、有名望與具社會影響力的人士等，他們可能對政府所面對戰爭的態度具有不等程度的影響力。

（五）當「主戰」與「主和」的齟齬出現在政府與美國／國際社會之間

假說五：當政府與美國／國際社會有關「主戰」與「主和」之意見衝突愈大時，雙方愈不容易採取一致的立場以應對戰事；當雙方有關「主戰」與「主和」之意見衝突愈小時，雙方愈容易採取一致的立場以應對戰事。

說明：本文認為，美國的態度以及國際社會的輿論對台灣是否「主戰」

或「主和」至為關鍵，其中又以美國為最主要的核心關鍵。

綜合以上，本文認為，對台灣而言，「美國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所定調的方向或採取的選擇（戰或和）將直接影響台灣的決定—戰或和。至於執政黨與政府部分，若是總統與執政黨的表現穩健且獲得相當程度的民意支持，加以「台澎防衛作戰」本身對台灣而言是屬「防衛作戰」、「衛國戰爭」，其應戰的正當性遠高於侵略性戰爭，因此「主戰」應該會獲得較強大的力量支持，而這也應該會反應在國際社會輿論與台灣內部社會兩者，甚至也反應在反對黨本身。因此，在應對「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上，台灣最重要的戰略溝通對象仍是美國，其次是其他的單元。然而，政府也必須意識到，就算其他單元對我國對台海戰爭的態度意見差異不大，政府也不應該放棄任何對內與對外的戰略溝通，尤其是與在野黨進行對話。唯有一個對台海戰事態度越趨一致的台灣，其將更有助於應對「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這是台灣應該要做好的政治準備工作。

肆、台灣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 尾聲與之後的政治功課

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接近尾聲與戰事結束之後，本文認為台灣最主要面臨的政治課題乃是「台灣」與「中國」兩者之間的政治關係如何重新界定的問題，尤其是在法理上（*de jure*）如何定義，以及在法制上（*legal*）如何落實。關於此一問題，這是極為典型之「軍事」與「政治」的連動關係，而軍事的結果將決定政治的新格局與新秩序。

在「軍事」與「政治」兩個面向當中，根據二分法的原則，從台灣的角度而言，首先，「軍事」面向可區分為：第一、台灣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中獲得勝利（中國則遭遇失敗）；第二、台灣遭遇失敗（中國則獲得勝利）。詳言之，台灣勝利（中國失敗）即表示台灣在戰爭

中擊潰並粉碎中國所持「登陸台灣、佔領島嶼、並且有效統治」的目標；台灣失敗（中國勝利）即表示中國在台海戰事中完成其所持「登陸台灣、佔領島嶼、並且有效統治」的目標。其次，「政治」面向可區分為：第一、以「台灣」為主體思維與架構的新政治框架以及與中國的關係；第二、以「中國」為主體思維與架構的新政治框架以及與中國的關係。詳言之，前者即是以「台灣主體」做為台灣新的憲政架構與秩序，並且以此建構其與中國的政治關係，而台灣的意志與價值能在此當中充分地落實；後者則是以「中國主體」做為台灣新的政治架構與秩序，並且以此建構其與北京的政治關係，而中國的意志與價值則在此當中充分地實踐。

依此二分法與「2 乘 2」的方式，本文演繹如下四種台海戰事後「軍事」與「政治」連動的可能結果（參照：圖 3）。

一、台灣獲勝，但以「中國主體」為新政治秩序

在第一象限中，台灣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獲得勝利，然而在戰後的新秩序中卻採取以「中國主體」做為意志與價值的憲政秩序，並選擇做為中國所屬的政治次單元。本文認為，台灣會出現這樣的政治結果與選擇是有違一般常態性的邏輯，而預估在實際經驗上亦不太可能發生，因此我們略去第一象限裡相關內容的討論。

二、台灣獲勝，並以「台灣主體」為新政治秩序

在第二象限中，台灣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取得勝利，並且在戰後的新秩序中採取以「台灣主體」做為意志與價值的憲政秩序，並架構台灣與中國的新政治關係，這應該是較符合一般常態性的邏輯，同時也是可能在實際經驗上發生。而此一結果又可推演出兩種可能的政治選擇。

（一）政治選擇一：訂定以「台灣」為主體的新憲政體制

台灣揚棄「中華民國」國號與憲法，訂定新的國號與憲法，而在新的國號與憲法當中大量採取「台灣」的元素，不在植基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理念，改採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基本價值的三權分立憲法。與中國的關係則界定為「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與國關係」，雙方互相承認、建交、派駐大使；台灣以新國號加入聯合國，並參與聯合國所屬各項國際組織。此可謂「一台一中」之型態。

（二）政治選擇二：保留「中華民國」而進行若干更新的憲政體制

台灣保留「中華民國」的國號與憲法，然在中華民國憲法當中可能透過修憲的方式放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理念，而改採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基本價值的三權分立憲法，並在修憲中大量採取「台灣」的元素。與中國的關係則界定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與國關係」，雙方互相承認、建交、派駐大使；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加入（或重返）聯合國，並參與聯合國所屬各項國際組織。此可謂「兩個中國」之型態，即一個「中華民國」與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此名稱上雖是「兩個中國」，其實質上則是「台灣（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與中國（正式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與國關係」。

三、中國獲勝，但以「台灣主體」為新政治秩序

在第三象限中，台灣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中遭遇失敗，北京最終登陸台灣、佔領島嶼、並且有效統治。就邏輯與可能的實際經驗而言，此時的台灣難以「台灣主體」做為意志與價值來建構其憲政秩序，也難以架構一個「台灣與中國對等」的新政治關係，因此我們略去第三象限裡相關內容的討論。

四、中國獲勝，並以「中國主體」為新政治秩序

在第四象限中，台灣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遭遇失敗，

北京最終登陸台灣、佔領島嶼、並且有效統治。就邏輯與可能的實際經驗而言，北京不大可能允許台北方面繼續持有其原先的統治基礎與架構，而是會改以「中國主體」與「中國元素」做為新的意志與價值，並以此做為台灣新政治秩序的規範。此處所謂「政治秩序」，而非「憲政秩序」，是因為台灣已不再是一個「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其無憲法，自然亦無憲政秩序可言；據此，台灣將被安排成為中國所屬的政治次單元(sub-unit or sub-national)。這又可推演出北京可能採取兩種政治安排。

(一) 政治安排一：台灣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

台灣被規劃為中國的一個「省」，其地位則如同河北省、湖南省、福建省一樣，是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底下的一個省分，是屬於一級地方政府，其自是沒有外交與國防的權力。除有省政府及其以下各級地方政府的建制與首長之外，其亦有相對應之各級的中國共產黨「黨委書記」。

(二) 政治安排二：台灣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台灣被規劃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地位則如同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權，但仍無外交與國防的權力，而且有解放軍的駐紮。其地位與省一樣，同屬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底下的一級地方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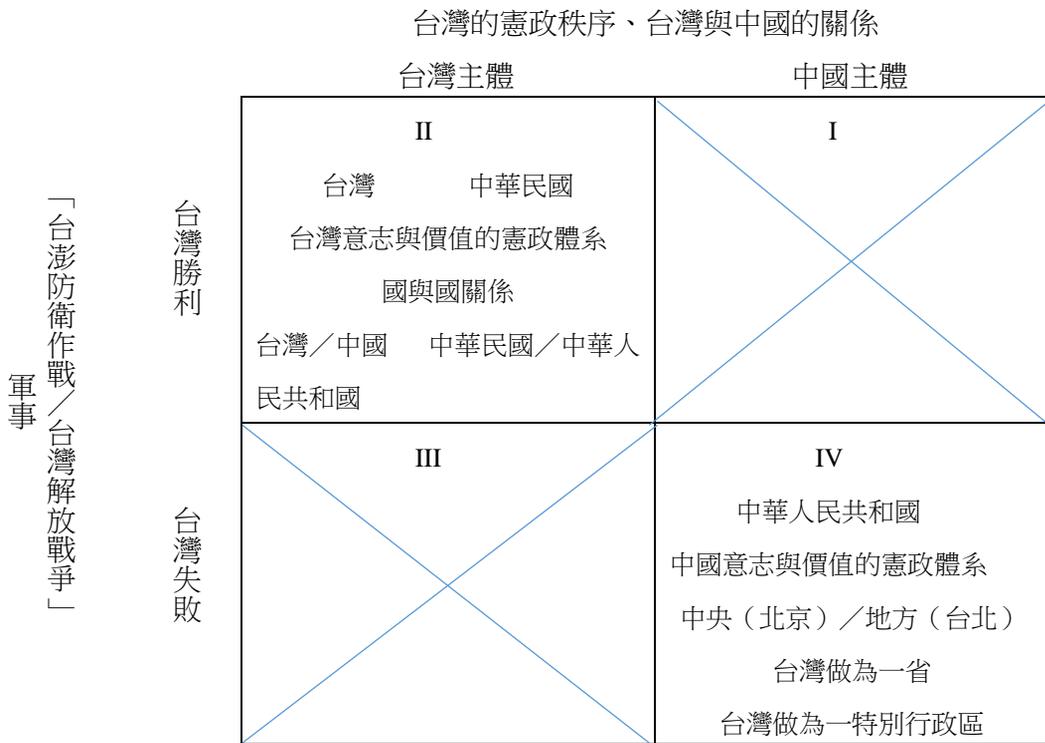


圖 3：「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結束後之
「軍事」與「政治」結果推演

綜合以上，本文認為，對台灣最為有利的是取得台海戰事的勝利，而勝利之後的憲政秩序以及與中國的關係將「順其自然地」往以「台灣主體」為基礎的方向發展，與中國的關係也將會是「國與國的關係」。至於國號與憲法名稱是台灣或是中華民國，容或有不同意義與不同考量，但兩者應該都離不開以「台灣主體」、「台灣元素」、「台灣意志與價值」為其核心，也離不開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基本價值的三權分立憲法。雖說這是戰事接近尾聲與終了之後的政治課題，然台灣必須一方面在軍事上全力以赴追求勝利，另一方面則在政治上更加實踐自由、民主、人權、與進步的

價值，將其落實在憲法、立法、與政策當中（此在戰事之前即可實施進行）。至於新的憲政秩序以及與中國的關係等問題，則可置於戰事末端才開始觸及。相對地，對台灣最為不利的是在台海戰事上失敗，因為若是輸掉台海戰事，台灣將很難以「台灣主體」、「台灣元素」、「台灣意志與價值」做為其政治的核心，取而代之地將會是以「中國主體」、「中國元素」、「中國意志與價值」做為其政治的基礎與規範。總而言之，台灣必須先求、力求台海戰事的勝利，同時深化、鞏固民主政治。

伍、結論

對台灣而言，「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不單是軍事上的準備與應對而已，在攸關戰事（軍事）的成敗上，台灣必須留意在整個過程中的政治問題與挑戰，並且做好相對應的準備。

在台海戰事爆發之前與進行之中，台灣面對戰爭態度的「一致性」至關重要，當主張「應戰」與「持續戰鬥」的一致性愈高時，則加予台灣在軍事行動上的支持也就愈高，而軍事行動上勝利的機會也就愈高。反之，當主張「應戰」、「持續戰鬥」與「反戰」、「停止戰鬥」愈分歧時，則加予台灣在軍事行動上的支持也就愈低，而軍事行動上勝利的機會也就愈低。此可謂是另一種的「政治作戰」，用以促成軍事作戰上成果。在此一「政治作戰」與政治準備上，美國的態度與立場是最關鍵的因素，不論是戰略或是戰術，台北必須力求與華盛頓在「台澎防衛作戰／台灣解放戰爭」上縮小分歧，口徑一致。至於其他面向，包括國際社會輿論，以及國內的執政黨、政府部門、社會輿論、與反對黨等，台灣亦必須力求縮小分歧，擴大共識。

至於台海戰事接近尾端與結束之後，台灣所面對最主要的政治課題是台灣自己的國家身份與地位如何重新界定，其憲法與憲政體制如何重新定

義與規範，以及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如何重新定義與架構。此一課題是軍事行動上的結果將決定台灣能採取什麼樣的政治選擇與安排。很顯然地，台海戰事上的勝利，台灣的國家身份、地位、與憲政秩序會從「台灣」的主體與元素去重新搭建，台灣與中國的「國與國關係」將更為明確。反之，台灣的身份、地位、與政治法律會從「中國」的主體與元素去重新建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則會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為此，台灣必須先求、力求台海戰事的勝利，如此方有下一階段討論的可能。

責任編輯：蔡旻綦